

抓落实要有正确认识和科学方法

——重温习近平《抓落实如敲钉子》

□ 徐贵忠

习近平同志 2006 年曾在《之江新语》专栏里发表过一篇名为《抓落实如敲钉子》的文章。文章内容短小精悍，语言朴实真挚，“家常话”哲理层出不穷。今天重温，深感大道至简！读一遍有一遍的领悟，读一遍有一遍的境界，仔细梳理，有三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践行于工作当中。

一是找“点”的问题。文中讲到，“抓落实就好比在墙上敲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这儿的“点”就是正确的方向、工作的杠杆或者是“过河的船”。如何让钉子不打歪，找准点？一要真对照。毛泽东在总结长征时讲到，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方向路线对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的。今天，领导干部抓中央决策部署落地、抓改革任务见效、抓单位全面发展，就要始终贯彻“重整行装再出发”“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精神实质，对照“方向路线”这把尺子，量一量工作筹划是否符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量一量工作标准是否达到中央要求，量一量群众的反应如何等等，确保工作方向不偏航。二要真调研。当前，越是需要抓紧抓实的工作，越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领导本人越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则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落实就隔座山。1947 年刘伯承率部挺进大别山，前有淮河挡路，后有敌人追赶，去察看的参谋回来报告，“大水滔滔，难以过河”。刘伯承当即问道：“应该看水深、流速、河底情况，‘大水滔滔’是什么概念？”并拿上竹竿亲自到河边试水深，判断部队可以过

河，从而甩开了追兵。因此，领导干部要察实情、收实效，就要时刻握紧沉到一线的“竹竿”，绝不能“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这样才能把“点”找准。三要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找“点”不准，跟讲政治意识不强、知识储备不够有很大关系。领导干部不学习，理想就会淡化、思想就会退化、知识就会老化、能力就会弱化，想有过人的见识能力，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在一些前瞻性、复杂性的重要工作上，容易出现不能正确驾驭的“硬伤”。因此，要做个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有从“大局”出发的学习意识，应有从学习中磨砺的真本领。

二是怎么钉的问题。“钉到了点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把力量凝聚到点上，着力解决涉及全局的突出问题……抓落实也要根据本地本单位的实际加以贯彻落实，而不是依葫芦画瓢、搞照搬照套。”从这段话中，我们悟出抓工作：一要有狠劲。清朝曾国藩打仗，不论对手看起来有什么可以追击的诱惑，都不为所动，对关键要地紧抓不放，这便是“结硬寨”；湘军每到一处不急于直接开打，而是每天抓紧挖壕沟，断敌粮道与补给，这便是“打呆仗”。我们抓工作落实，也要做到这“六个字”，对认准的事情，要有燕子垒窝、蚂蚁啃骨的劲头，要有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这样才能厚积薄发，做一事成一事。二要抓重点。抓住主要矛

盾，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实际工作中，一旦我们确立好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就要按照既定方案一锤接着一锤敲，“宁打一口井，不挖十个坑”。对已经纠治的问题要防反弹、对承诺解决的问题要兑现、对新出现的问题不放过、对深层次的矛盾敢触及，抓起来要拎总纲，确保锒铛不虛，这样才能从点的突破到把全面建设这个大头带起来，真正抓出实效。三要接地气。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和李德挟洋自重，照搬国外指挥战法，反对游击战，排斥“本土派”干部，致红军危在旦夕，不得已开始长征。后来如果不是毛泽东这样的“本土干部”，用了很多本土办法，指挥一渡赤水“避敌”，二渡赤水“歼敌”，三渡赤水“诱敌”，四渡赤水“甩敌”……那么结果就很难说了。中国革命成功靠接地气，搞建设、促改革、抓工作也是如此。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十分注重“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使宁德两年就走出了贫困线。因此，我们要想把工作干好、干出成绩，就要紧贴实际，不玩虚的，立足实情真干事，这样“地气”才接得上、接得通，我们的事业才有底气、得人气。

三是功夫在“钉”外的问题。习近平强调：“碰到容易脱落或者开裂的墙面时，还要想办法修补墙面，打好敲钉子的基础。”对于这个“钉”外的问题，怎样修墙面、打基础？一要剔除“新官气”。一些“墙面”不好，表现在：有的领导在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仅满足于“轮流圈阅”“层层转发”“安排部署”；有的领导习惯责任下移，想让“责任状”变成“免责单”；有的机关虽然门好进、脸好看，但“管卡压”变成了“推绕拖”等等，这样的“软墙

面”，钉子再深也不牢固。这种“新官气”要不得。于上，纠正“四风”的“紧箍咒”越来越紧；于下，群众监督的主动性越来越高；于己，古人云：“以官气显权威乃小人得志”，让群众爱戴是一种福分，对事业推动是一种增益，何乐而不为？要强化权力监督。公权墙面的裂缝，是被某些“任性”一点点撑大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权力任性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一些领域还存在一些自由裁量的空间、自由发挥的选项，存在一些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常用善用依法监督的有力武器，让领导干部习惯在“聚光灯”下成就业业、彰显能力；树起抓早抓小、违纪必究的高压线，强化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逐步构建“守纪者日进，违规者日止”的政治生态。三要坚持法之必行。破窗效应警示我们，法之不行，法就会成为“橡皮泥”“稻草人”。当前，我们很多工作有法可依的问题解决了，但执法这块“墙面”有时存在脱落或者开裂，导致贯彻力执行力打了些折扣。因此，要打好事业上的主动战，就必须坚持“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规制度明确怎么办就怎么办，情况再特殊也不“变形”，面临阻力再大也不“变味”，时间再长也不“变软”。这样，法治的“墙面”才平整，落实的“锤子”才能让贯彻的“钉子”不打歪，在墙体中扎得又实又深。

重读經典

冯班（1602—1671），字定远，号钝吟，江苏常熟人。他鄙视八股，屡试不第，遂专意古学。与宋儒及理学末流束书不观，侈谈性命不同，他反对空疏，重视读书，倡导实学。其治学之道，集中体现于《钝吟杂录》一书中。冯武称其“于是非得失处，非信而有征，不轻下一字”，四库馆臣称其“学有本原，论事多达物情，论文皆究古法”。因其“学行有本”，深受晚清经世实学领军人物陶澍和左宗棠的推崇。陶澍曾节选并手书《钝吟杂录》作为修身良言，并以之训戒家塾子弟。左宗棠继陶澍之后，也称许其作“语语平实切近”，“粹然君子之言”。

冯班治学强调“学贵求实”，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他对治学之道的阐述。

首先，学问要实身体贴，不可虚空揣摩。冯班非常重视读书，他认为“圣人好读书，豪杰好读书，文人亦好读书”，“进德修业，只懈怠处，便是堕落处”，书不仅要读，还要持之以恒地读。“不以读书为学”而束书不观的宋儒及理学末流，他们“不知圣人之道”，混同君子、小人之别，难免沦为“小人儒”，甚至沦为无赖市井。在强调重视读书的同时，他还指出，书中的道理虽好，却也需要读者实身体贴，只有实见实行，方能有所发用。否则，只如“白面书生不通事势”，变成无用庸儒，甚且为害天下。他主张“君子有心于古道，慎无以学术误天下”。所谓“以学术误天下”，是指宋儒及理学末流，他们不务实学，于古圣先贤之道，不能实身体贴，不能实见实行，只是高谈阔论，侈谈性命。“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倘若醉心这股“学术”，长此以往，不仅会误己误人，还会误事误国。有志于学习古圣先贤之道的人，于学问上需讲求一个“实”字，谨慎避免虚空揣摩。

其次，学问要原情考实，不可悬断是非。他见其从子冯武案头有《少微通鉴》一书，便正色教育道：“昔人之事，成败已见，得失显然，不须更翻公案。凡为此者，不过好立议论，求免耳食之诤耳。汝輩读书，须善审时势，不可一味将‘正心诚意’套语妄断前人。”意即过去的史事，其成败得失，早已论定，不可更改。我们应当“原情考实”，审时度势，“论利弊”以“说是非”，具体而微地分析各种因素，尽力去掉虚假信息，求得史事的真实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

【讲话原文】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大学对青年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

【出处】

窃维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方今时局孔亟，事事需材，若不广为培养，材自何来？……是设立学堂，即今日亟应举办之一端。

——（清）张之洞《创设储才学堂折》

【解读】

清朝末年，外患日亟，国事艰难。晚清重臣张之洞深感欲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创建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因此首倡开办新学之风。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月，张之洞向清廷上呈《创设储才学堂折》，提出在南京设立储才学堂。他忧心如焚地说：“窃维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方今时局孔亟，事事需材，若不广为培养，材自何来？”这段话阐述了国家、人才、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张之洞认为，国家

情况，不可一味用心性义理的套语妄断前人。况且，“好立议论，求免耳食”的学问，因其不实，便也无用。“读古人之书，不师其善言，好求诡异以胜古人者”，是最愚蠢的治学方式。不“见贤思齐”，反而“吹毛求疵，洗垢索瘢”，“非薄古人”，这不仅会“貽笑将来”，也恐“有损盛德”。史事距今相去甚远，当下的事尚有无法细究推求之处，何况百世以上？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冯班秉持此种精神，认为对待史事中于意有所不合的地方，有是非疑惑却苦于没有证据证其为是或证其为非的地方，不妨阙疑，存而不论，万不可为“招合虚誉”而“悬定是非”。

再次，学问要学以致用，不可求快贪多。他说，“临大难，当大事，不可无学术”，废书不读是缺乏深谋远虑之举，尤其有才学有德之人，更需要读书。但读书不能求快贪多，“开卷疾读，日得数十卷，至老死不懈”，不可谓不勤，却毕竟无益。因读得太快，文字尚且不能深刻记忆，遑论仔细分析，推求大意。如此，读书虽勤，效果却如同未读。程颐说，“一部《论语》，未读时是这般人，读了只是这般人，便是不曾读一般”。他十分认同程颐的这一观点，认为这种教人读书的方法最为“恳切”。《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广泛涉猎，但须是“读一句是一句，理会得一分是一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汉志·六艺略》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古人读书多是“为己之学”，并不求快贪多，他们更注重学到的东西能“通”能“用”，体之于身心则拙诚笃实，用之于事业则济众博施。治学之要，在于功夫上身，一以贯之。如此，读书虽慢，却能学以致用，终成其大。

《大畜卦》彖传云“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大象传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卦义告诫我们要“修学储能”，“取先贤之教言”以“助日新之盛德”。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重视学习，又不忽略践履，才是最快乐、最有益的治学之道。只有如冯班一样，反对空疏，倡导实学，重视读书，讲究学贵求实的治学方式，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着力提高全面从严治党质量

——读《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布局》一书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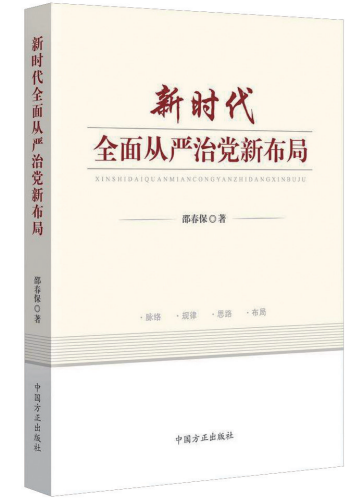
□ 张志明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目标，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期待，即要进一步实现党的建设从“有形”到“有效”、从体量到质量、从入脑到入心、从上层到基层的深化和延展，以不断巩固和扩大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和影响，并切实从具体的办法和制度上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也是对全党提出的重大研究课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进一步的探索创新。邵春保同志的新著《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布局》，是这种探索创新的前沿成果。

在党的建设的研究成果中，一直有两种错误倾向制约着党建研究的质量。一种是纯粹的所谓党建学理论研究，力图简单化地以西方政治学和法学等理论范式来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理论，其结果是自说自话，使得广大的党务实践者看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更不知道如何操作，甚至造成对党的建设真义的扭曲和“解构”，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另一种倾向是，忽视党的建设理论建设意义，把党的建设看作是纯粹的工作实践，所需要的仅仅是不断总结工作经验，甚至把工作经验认为是党建规律，是不需要进行学科建设和学理研究的，因此，所出的一些所谓成果，充其量只能算作实证的一些案例或工作总结。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在党建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严重影响了党的建设的研究质量和实践水平的提高。新时代呼唤的是党建理论和党建实践能够实现有机结合，并让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巨大的理论力量引领和实践操作指导的党建优秀研究成果，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这一重大命题的新时代要求。

邵春保同志的这部专著，为这种结合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书中的很多观点、思路和办法建议，显示了深厚的理论研究功底和实践经验积淀。

比如对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党



的事业之谓内在关系的揭示。书中谈到，党的建设是为了夯实党的领导的基础，党的领导是党的事业的本质特征，党的事业的推进检验党的领导的成效。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是一个事物的三个层面，既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内容，又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统一起来就顺畅、和谐，否则就别扭、扯皮。这就比较透彻地把三者的关系梳理清晰了。

比如谈到党的全面领导与党的全面建设要同步推进的关系时谈到，正如“木桶原理”，只有党的全面建设和全面领导充分契合，科学对应，才能释放出党领导一切的最大优势。如果缺少错位，势必造成实践中的漏洞和问题，影响党的领导力和党的建设成效。

比如讲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路上的曲直规律时认为，从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建设由转变入手，以强力反腐震慑，到抓管党治党这个根本，虽然内涵在丰富，外延在拓展，但永远在路上却是共性的、不变的，这是对事物发展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尊重和认识，是对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有效运用，更是一种理论清醒和政治自觉。

比如在如何建立干部的激励机制时，提出了贯彻“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三部曲”，

即把容错纠错的精神告知在前，让心存顾虑的同志放下包袱，甩开膀子干事业，防止在改革创新中踌躇不前；把容错纠错精神融入规章制度中，分清原则性和非原则性，初次错误与屡次犯错，故意为之还是过失错误，以及同样错误性质的不同程度；把容错纠错体现在执纪问责实践上，考虑动机与效果、为公与为私等因素，运用“四种形态”妥善处理。

比如提到履行主体责任的三种有效方法时指出，要既见物又见人，既要经济工作、实际工作中的数字和指标，又要分析这些事物背后人的情绪、思想、态度和行为，善于做人的工作、群众工作，弄清问题真相，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既见业务又见作风，不仅要关注业务和发展的结果，还要关注过程，与弄虚作假等不良作风作斗争；既见问题和现象又见深层次原因，不能就事论事，只处理基层干部和直接责任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领导决策、管理环节、各种保障的深层次问题，系统思维、综合治理。

上述这些，都体现了新时代提高全面从严治党质量所亟须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和要求，读来既有学理的感悟，也有实践操作方面的借鉴。

拜读《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布局》一书过程中不由得亲身体会，党的建设研究其实一直蕴藏着巨大的资源和力量，如何激发、挖掘和充分利用这种资源和力量，也是提高党的建设研究质量和实践水平的重大课题。许多工作在党建实践一线的同志，对党建理论也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如果把这支党建实践一线的研究队伍与专门从事党建理论研究的学者队伍结合起来，形成党建研究的合力，一定会对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质量的提高产生大的催化作用。

读而思

学贵求实——冯班的治学之道

□ 付守磊

